学术专论

经古学统与经世诉求
——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的学派背景

陆　胤

［摘要］清代道咸以降，经阮元等主导，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代表的经古书院蔚成风气。但在晚清危急局势的逼迫下，以汉学考据见长的经古书院体制，亦不得不有所更张。张之洞督粤期间创建的广雅书院，即兼有“经古”与“经世”的双重取向。借助地利之便，陈澧一派的粤学正统被张之洞援引为书院创立的资源，“东塾学派”成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梁鼎芬等东塾后学却截断了从阮元到陈澧的连续脉络，在汉学考据的传统之外，重新发掘以学术影响世道人心的新学统。本文关注张之洞及其幕僚创建广雅书院的学派背景，借重《赵凤昌藏札》、《广雅书院文稿》等史料还原细节，尤其注意张之洞系统与阮元以来经古书院传统展开的对话。

［关键词］张之洞　广雅书院　经古书院传统　陈澧　东塾学派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2－0117－11

Statecraft Demands under the Provincial Academic Tradi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ya Academy

The provincial academic tradition begun by his precursor Ruan Yuan（1764-1849）had a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famous late Qing scholar-bureaucrat Zhang Zhidong（1837-1909）. However, after he assumed the viceroyship in Guangzhou in 1884, Zhang and the literati around him intended to transcend the experiences of Ruan and other precursors, with a strategy of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local academy sources such as Chen Li's（1810-1882）Dongshu School. In 1887, Zhang founded a new provincial academy called Guangya Academy to practice his eclectic academic opinions and statecraft demands. All these provincial academic experiences were accumulated in Zhang Zhidong's circle and prompted the latter to occupy an essential position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清代大吏弘奖文教的传统堪称久远，清初徐乾学、王士禛等人周围，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学人圈子，从事诗文酬唱、学术研讨、方志修订、版本校勘等活动。然而，有意识地提倡一种新学术（“汉学”），并以新式机构（经古书院）将之固定化，则始自阮元。嘉庆年间，阮元先后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专课经古之学，成为乾嘉汉学研习、传播的重镇。受此风气感染，道咸以降，如江宁惜阴、苏州正谊、上海龙门、广州广雅、江阴南菁等书院纷纷以“汉学”为表帜，形成清代中后期经古书院的传统。然而，时至外患深重、西学东渐的晚清，以汉学考据见长的经古书院，未必能应对时势变迁与人心动荡。兼具经世期许与兴学使命的地方督抚，如何对待经古书院的既成学统，亦成为一问题。

［收稿日期］2012－11－15
［作者简介］陆胤（1982—），男，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北京 100871

晚清张之洞自“清流”谏臣而外任学政、督抚，继而致力于文教改革与西式学制的引进。介于新、旧之间的位置，加上张之洞“士林领袖”的自期，为考察上述问题提供了绝佳视角。自同治六年（1867）外放学政以来，张之洞每至一地，便致力于创设或整顿书院，颇以引导地方学风自任。其中，如武昌经心、成都尊经、太原令德堂，均为援引诂经精舍、学海堂经验的经古书院，促进了乾嘉汉学在内地的流播。但其在两广、湖广总督任上兴建的广雅、两湖二书院，则较为复杂。二者划然为一种新制度，并在戊戌以后较为成功地接轨西式学制，引起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①]本文关注光绪十至十五年间（1884—1889），张之洞及其幕僚创建广雅书院的学派背景，借重《赵凤昌藏札》、《广雅书院文稿》等史料还原细节，尤其注意张之洞系统与阮元以来经古书院传统展开的对话。在广雅学风形成的过程中，陈澧开启的“东塾学派”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当了张之洞超越前代督抚兴学经验的凭借，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乾嘉汉学正统在近代语境下的调适与衍变。

一、广雅书院的折衷体制

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初署两广总督，正值军务倥偬，无暇顾及文教。至光绪十二、三年（1886—1887），战事逐渐平息，开办书局、整顿书院等措施次第展开。最初，张之洞颇援引昔日门生故吏及“清流”同道，缪荃孙、许景澄、袁昶、孙诒让、沈稼村等人均在招罗之列。[②]而在安排书局人事时，则考虑到阮元以来粤中校勘经籍的传统，并直接继承了前任广东布政使姚觐元刊书的人脉，以李文田、梁鼎芬、陶福祥、廖廷相、郑知同等粤籍或长期寓粤的学人为骨干。[③]由于张之洞督学各地负有盛名，亦有通过幕府主动干谒的情况存在。如常州学人屠寄滞粤时，即通过在张幕充当心腹的同乡赵凤昌求谒，进呈自撰古文辞及经史著作，奉张之洞为朱筠再世，而自拟洪亮吉、黄景仁，[④]后入幕府主理文案，任职于广雅书局。此外，凭借既有的学人关系，形成辐射性的网络，也是书局、书院人脉形成的重要方式。如门生杨锐曾先后向张之洞引荐梁鼎芬、朱一新、林绍年主持端溪书院；[⑤]而梁鼎芬获得张之洞信任后，又曾推荐刘岳云、沈曾桐、缪祐孙、陈三立、宋滋蓍等人。[⑥]

光绪十二年（1886）广雅书局开办，张之洞幕僚王秉恩在致信缪荃孙时，提到书局宗旨：“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⑦]俨然欲借“史学”超越学海堂刻书的成就。张之洞本人亦曾致函缪荃孙，说明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史注之属；一、洋务，此须合近日外国纪述及中华人书关涉洋务边海各防者，择要纂成一书，事体太大，须思一收束法。……此外如子、集两部，有佳者亦可带刊。”[⑧]不难想见广雅书局刻书计划之宏远，“专刊经史有用之书”的经世倾向甚为显著。其时张之洞聘请“粤中老宿”坐局总办，由缪荃孙在京师、上海等地搜罗底本。经学方面，并不满足于刊刻既有训诂考据著述，而更注重自编经义、经例。张之洞曾手批《左传》、《易经》等经书凡例，命廖平、宋育仁、王绳生等门生据之编纂《左传经例长编》、《易经长编》，即戊戌以后《经学明例》、《十三经学》的前身。[⑨]诸人进行编辑时，以张之洞所定“凡例”为纲，“先采国朝人书，俟纂齐，再择唐宋人之说，以类附入”，[⑩]颇似阮元开修《经籍纂诂》的成法；但其关怀所在，却由小学训诂转入微言大义。

较之书局刻书，书院课士更是引导学风的方便门径，且作为兴学一方的政绩，更为显著而久远。在此方面，张之洞不仅凭借其早先督学各省的经验，更有赖梁鼎芬等粤籍士人的参与。光绪十一年（1885）梁鼎芬劾李鸿章罢归，旋即得到张之洞的庇护，任惠州丰湖书院院长，一年后移主肇庆端溪书院。端溪是两广总督直辖的行省级书院，张之洞拜请梁鼎芬出任院长，有以全省文教相托付之意。光绪十三年（1887）夏梁鼎芬到任端溪后，颇致力于整顿：在时文、试帖诗之外加课经古，开辟“讲书”制度，制定生徒住院办法，竭力肃清贽见随封、克扣膏火、倩代作弊等书院积习。[⑪]但由于肇庆地处偏僻、风气闭塞，书院事务又为劣员把持，梁鼎芬自觉颇难施展，张

之洞遂有在省会移建或新建书院的计划。

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张之洞上奏设立广雅书院，原奏稿题作“两广经古书院”，旋又将“经古”二字涂去。[12]可见在是否如学海堂、菊坡精舍专课经古的问题上，幕府曾颇费斟酌。至于书院课程，原拟经学、史学、词章三科，不出经古定制；后在行间增加“身心之学”（后改为“性理之学”）、“经济之学”。[13]到最后上奏时，广雅书院课程与侧重经史词赋的经古书院章程比较，已然有所不同：

> 院内课程：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归。[14]

后来广雅书院确立学规，课程说明更为详细。概言之，经学注重“通大义”，理学不囿于空谈，经济之学包纳当代掌故，亦即须在考据中见义理，义理又须付诸实用。又规定子部书随意涉猎，词章各门兼习，均不列为专门。而尤其注重“士习”之肃清：“院内诸生，不得恃才傲物、夸诞诡异、诋毁先儒、轻慢官师、忌嫉同学、党同伐异以及嬉荒惰废。以上三条，如有不遵，即行屏斥出院。”[15]对于诸生的引导乃至控制，较严于阮元以降的经古书院，而更近似传统意义上的督抚行辕书院。

广雅书院的兴建，缘起于端溪等旧有行省书院之整顿。故广雅虽然注重经史、不试时文，却保持了与行省书院地位相匹配的规模与政教功能。[16]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缪荃孙应梁鼎芬之邀到访广雅，惊叹“气局宏敞，为地球上书院之冠，西人所颂也”。[17]广雅书院占地一百二十四亩，“楼阁高特”，庭园精致；且为兼收广东、广西两省生徒，建有东、西斋舍二百间，俾学子均能住院讲习，“萃处久居，而后有师长检束、朋友观摩之益”；[18]住院制度带来院生生活方式与研习方法的变化，自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等经古书院的“有课而无斋舍”不同。实际上，广雅书院正是在此前行省书院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以总督辖区为界的“两省书院”的新制，更适于总督敷陈教化、贯彻一己学术主张，亦呈现出更多“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特点。后来两湖书院兼收湘、鄂学子，即取法于此。

其次，“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的色彩……所以能代表各时代的精神”。[19]诂经精舍祀许慎、郑玄，学海堂奉祀阮元，代表了乾嘉汉学的宗尚与师承。而广雅书院所奉祀，却是作为理学渊源的周敦颐：“宋儒周子曾官岭南，著有德惠，并无祠宇，于义阙如；今建祠院中，并祀古今宦寓名贤、本省先正有功两粤文教者，以示诸生宗仰。”[20]其实张之洞所重视的，并不止于周敦颐的性理学说，而是其宦寓粤中、传播文教的政绩。督粤时期，张之洞颇属意于兴起祠宇，曾在潮州重建韩愈祠，在琼州兴起苏轼祠，并命琼、崖地方官查访李德裕后裔，咨送来省，允给出路。[21]广雅书院兼祀“外来宦寓”与“本省先正”，既含有融会粤省内、外风气的用意，更表现出张之洞自身在“政”与“教”、“官”与“师”之间的权衡，迥异于清代中期以降各地经古书院竞祀许、郑的潮流。

在人事制度上，广雅书院设有院长，“常年住院，定议立案，不拘籍隶本省外省”。院长职责兼摄书院行政及诸生学业两方面，包括巡行监督、升堂讲书、检阅日记、批答问业等。稍后为了减轻院长负担，才仿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制设立“分校”，课程亦改为较具操作性的经、史、理、文四科。担任分校者“专取诸两粤本省之人，不及别省之人”，首批黄涛（经）、林国赓（史）、马贞榆（理）、黄绍昌（文）四人均为学海堂出身，后三人且为陈澧入室弟子。张之洞认为：“广雅书院事关两省，人才众多，若仅设学长，无所统系，其势必涣散参差，趋向学业，不能画一”，故分校不选通籍之人，名位上逊于院长，仍受院长统制。[22]正如前贤指出一般：“广雅书院之兴，虽然为新创制度，其实是折衷于旧式书院的考课与新式书院的实学之间。”[23]

广雅书院的折衷体制，有别于张之洞就任两广以前的提倡经古。张之洞莅粤后，所面临的学术环境与早年督学时有所不同：一方面，粤中经古书院已有阮元的经验在先，道咸以降，正是汉学流弊显现、汉宋水火相争之时，

故广雅书院“大旨欲力救汉学、宋学之偏，痛戒有文无行之弊”，强调汉宋调和，却更偏于救治汉学流弊。另一方面，五口通商以来，广州日益成为华洋杂处之地：“事杂言哤，习俗所移，其志趣凡下者多存希图幸获之念，其才智颖悟者或有歧于异学之忧。”[24]在西学压力下，捍卫“正学”的诉求比乾嘉时代（或同光时期尚较封闭的内地）更为急迫。而张之洞救治学弊的苦心，尤与其幕僚梁鼎芬等所传承的陈澧一派学说存有共通之处。

二、张之洞与“东塾学派”

张之洞中年以后，颇以吟咏自娱，阅世既深，诗境亦臻于老练。其佳者如《忆蜀游十一首》、《忆岭南草木诗十四首》等，并不止于模山范水、雕琢花草，而往往在山水草木的追忆中，寄寓学术人格的理想。[25]《忆岭南草木诗》的第二首《此君亭竹》，即涉及阮元与学海堂造士。[26]此诗在追念阮元教泽的同时，并忆及学海堂诸生每月集课、岁时祀阮元的景象。[27]然而事实上，学海堂在张之洞督粤以前已趋凋敝，经过两次“夷寇”之难，不仅经籍、书版大量散失，院生也往往不来应课；学长甚至会要求高材生托名多作，以充课卷数目。[28]张之洞到任后，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札三司增加学海堂专课生名额，并增修馆舍，将每季一课的旧制改为每月一课。[29]

同组诗中另有一首《菊坡精舍朱槿》，立意与前诗类似。但所追怀的对象，已是在阮元身后肄业学海堂、并继而主持菊坡精舍的陈澧。菊坡精舍创于同治六年（1867），考课经史文笔一如学海堂成法；在陈澧去世后，亦不设院长，而公举学长四人任评教。阮元与陈澧分处乾嘉、同光不同的学术阶段，一为羽翼汉学的提倡者，一为“尽划汉宋畛”的救弊者。此诗表达私淑东塾学统之情，引未及与陈澧晤面为平生憾事。“通德在番禺”一句，暗用《后汉书·郑玄传》孔融建议在郑公乡开“通德门”的典故。将调和汉宋的陈澧，比作集两汉经学大成的郑玄，可见张之洞心目中陈澧的地位。

张之洞与陈澧虽缘悭一面，却曾互致赠答。光绪五年（1879）陈澧七十寿辰，张之洞时官国子监司业，乃集《后汉书》陈元、陈寔传语寄赠楹联：“栖迟养老，天下服德；锐精覃思，学者所宗。”[30]陈澧寄还的答联则云：“万言笔语关文运，十载神交寄我心。”旁有款识：“孝达（张之洞）尊兄先生惠寄楹帖，其语过奖不敢当，书此奉酬。近年得读大著《辅轩语》，回忆庚午岁（1870）读浙闱策问，服膺至今十二年矣。”[31]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初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发策拔取朴学人材，已引起陈澧注意。而《辅轩语》等训示学术门径的著作，亦颇有与东塾学术呼应之处。袁昶曾提到张之洞治经最服膺陈澧，寄篆联自称“私淑弟子”，[32]若就学术主张的外在表现而言，的确不诬。

张之洞督粤以后，吸纳陈澧门人进入幕府、书院、书局，获得了与“东塾学派”接触的机会。其中，梁鼎芬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人物。梁氏外祖张维屏曾任学海堂学长，陈澧尝从其问诗。张维屏去世，陈澧又为撰墓志碑铭，并编辑其遗诗。[33]陈澧与梁鼎芬伯、叔祖亦论学相契，曾结为姻亲。同治十年（1871），年仅十三岁的梁鼎芬首次谒见陈澧，数年后进入菊坡精舍肄业。据说因为这两层亲故关系，陈澧“责望鼎芬亦倍于他人”。[34]光绪八年（1882）陈澧过世，十一年梁鼎芬自京师罢归，在为张之洞筹办广雅书院的同时，亦协助同门陈树镛董理东塾遗集。故其诗对于“东塾学派”的描述，大致可靠：[35]

> 吾师体大雅，所学造明光。菊坡接学海，（自注：东塾师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为菊坡精舍山长。）成就难具详。胡（锡燕）赵（齐婴）启始秀，踵起有廖（廷相）王（国瑑）。谭（宗浚）黎（永椿）饶（轸）二林（国赓、国赞），各以一诣长。马（贞榆）沈（葆和）最朴洁，教广陶（自注：福祥，禺山书院院长。）与杨（自注：裕芬，两湖书院经学分校）。后来富俊彦，略记温（仲和）陈（伯陶）汪（兆铨）。哀哉冯孝子（焌光），陈生（树镛）共悲伤。[36]

廖廷相、林国赓、马贞榆、陶福祥、杨裕芬五人，先后供职于张之洞创立的书局、书院，可

见陈澧弟子在张之洞周边的势力。

诸人之中，陶福祥年辈最长，同门的梁鼎芬、杨裕芬亦出其门下。陶氏深服陈澧调和汉宋学术门户之说，尝作《汉学箴》、《宋学箴》以见志；又精于目录校勘，对诸家版本、源流得失了如指掌，辑《应读书目》一帙示及门，张之洞《书目答问》后出，多与暗合。[37]张之洞督粤后，聘其为广雅书局总校；移督湖广，又以两湖书院经学分教招之，致书有云："阁下为东塾先生高第，渊源宏深，经学小学博综醰萃，平正精密，鄙人在岭外时数聆麈论，心折已久，若得高贤来主皋比，必能牖启士林，昌明绝业，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38]

廖廷相早年为刘熙载所拔取，赴京会试，陈澧附书令修谒，内有"岭南学术振起，必属此生"之赞。其时张之洞官居翰林，尝与人言："广东来一颜子，公等见之否?"同时在京的缪荃孙亦心折其学。[39]后任广雅书局总校，并继梁鼎芬、朱一新出掌广雅书院。

林国赓亦曾推演陈澧融会汉宋、折衷郑朱之说，[40]而所长尤在史学："以经学非见之实用则无裨于世，故说经恒以史证经，牓其斋曰'近鉴'；以史学地理为最要，于中外形势险隘讨究至详……搜辑佚史八百余种，积稿盈两巨簏。"[41]陈澧曾著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林国赓强调史学、地理，自是师承，亦恰与张之洞刻书"别开史学"的理念相合。他被张之洞拔取为广雅书院史学分校，后又任教于两湖书院。

此外，如马贞榆、杨裕芬等皆年辈靠后，主要活动于张之洞督鄂时期。梁鼎芬诗开头还提到"高第推于（式枚）文（廷式）"，张之洞曾欲聘文廷式掌教丰湖书院，但文廷式认为"南皮（张之洞）非心之所服，掌教非才之所堪"，予以拒绝。[42]梁鼎芬的至好陈树镛亦曾被张之洞邀至丰湖，梁鼎芬主广雅书院后，又欲任之以分校，未就。[43]

三、经古学统的变异

较之阮元开辟的粤东汉学传统，"东塾学派"对张之洞而言是更切近的资源。然而，从阮元的羽翼汉学到陈澧的沟通汉宋，宗旨变化背后自有其连贯理路；张之洞作为外来的文教指导者，在扶持、表彰当地学术传统的同时，却未必遵循乾嘉以降粤学流变的本来脉络。光绪十四年（1888）春夏间，张之洞与昔日"清流"同道宝廷之间，有数次论学通信。[44]宝廷根据宋学立场驳斥汉学，并涉及西洋天文学说，张之洞不以为然；而当宝廷将张之洞与阮元比拟时，张之洞亦不得不有所分辩：

> 承示驳正戴（震）、阮（元）、李诸说，甚当，佩服，与鄙见正同。鄙性于汉学、宋学皆所敬爱，尤深恶好奇蔑理之汉学。今刻《学海堂续经解》，自当谨择。阮之文学，薄劣何敢望，然学术趋向不同，即有人以阮公相拟，亦不乐口。[45]

宝廷曾将自作的《理气性情说》寄示张之洞，即针对阮元《性命古训》、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诸书对"理"、"气"、"性"、"情"等理学概念的新阐释。[46]张之洞自称宝廷此举"与鄙见正同"，并指责阮元、戴震等汉学家的义理研究为"好奇蔑理之汉学"。换言之，张之洞心中的"汉学"自有其限度：作为治学门径固然可取，但考据学者建构新义理以抗衡宋学的努力，却遭其否认。问题在于，陈澧调和汉宋的思路，恰是在阮元、戴震等考据学者提倡新义理学的延长线上。张之洞"私淑"陈澧的表面之下，潜伏着两种路向不同的汉宋折衷论。

陈澧主张救治汉学流弊，并不是以废汉学家来求得义理。其对晚近学风流变的基本估计，是"将来宋学必兴，未必能为朱学，必讲陆学"[47]，若于此时诋毁汉学，势必招致"普天下无读书之人"的恶果。[48]更何况，陈澧认为"风气必有所因而转之，若今日忽然举程朱道学以教人，则必无应之者"。因此，只有以汉儒治经为阶梯，才能上攀汉人义理乃至实行，也只有如段玉裁、程瑶田、阮元那样的精通考据者，才有资格批评"汉学"。[49]这与张之洞所提倡的仅止于学术门径的"汉学"，实有微妙的区别。不同于张之洞、宝廷，陈澧对于阮元、程瑶田、凌廷堪、戴震等考据学者的义理追求，整体上较为认同：

> 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程易田

［畴］著《论学小记》、凌次仲著《复礼》、阮文达著《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讲经学者，未尝不讲义理也。[50]

张之洞虽也强调汉学有义理，但重在将宋儒推崇的《大学》、《中庸》等文本还原到汉儒传经的脉络中，实际上是说汉儒亦讲宋儒之性理；[51]陈澧一派所谓“义理”，则包括了阮元、戴震等掊击宋儒性理的新义理，二者有本质不同。如钱穆便指出：东塾之学，渊源仍在学海堂，“著《汉儒通义》，即芸台（阮元）《性命古训》之旧规也；力主读六朝隋唐注疏，即芸台《学海堂策问》所提倡也。”[52]

张之洞自称治经私淑陈澧，却不满于陈澧所师承的阮元，或取决于梁鼎芬等“东塾后学”对其师说的选择性吸收。光绪十二年（1896）春，梁鼎芬甫从京师罢归，即赴惠州就任丰湖书院山长。三月二日访同门陈树镛，畅论为学宗旨：“举宋儒‘风教虽微，吾徒当以死自担’；‘前辈凋零殆尽，续之使不绝，正在后辈’二说……相与感叹奋发。”[53]梁鼎芬至丰湖后，温习《东塾读书记》等师门遗训外，亦颇以理学家言自课。三月七日追记陈澧论戴震语，却并不完全认同师说：

> 先生又云：“戴东原曰：理义之学，可以养心。此言得之东原，不易也。”余考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意在排击宋儒，欲入穴以探子，非能以理义养心者。其云“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甚至谓“以意见杀人”；又云程、朱与佛、老同罪，语气甚悍。方氏东树故辞而辟之，直曰兽死不择音者也。[54]

陈澧本意，似是首肯戴震不停步于考据门径，而终能领悟追求义理、修养身心的重要性。然而，梁鼎芬却对戴震求索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颇为不满，接近张之洞、宝廷的意见。如果考虑到三人共有的“清流”背景，则此一学统上的变异并不难理解。

梁鼎芬进入张之洞幕府后，有诗概括陈澧的治学方面：

> 巍巍崇雅楼，肃肃传鉴堂。心知治乱故，处士不敢扬。著书正学术，考古定乐章。所怀在明备，梦寐游虞唐。发挥七篇秘，明白一世盲。恒于侍坐时，言语闻慨慷。惟中有束缚，同舍罕一狂。亭林有异同，二田岂颉颃……[55]

“崇雅楼”为陈澧避“夷乱”时所居，取自《毛诗正义》“小雅不可不崇”，亦即崇雅攘夷之意；“传鉴堂”因陈澧先世读《通鉴》而得名，梁鼎芬少时“尤服膺朱子及温公《通鉴》之学，为东塾先生所许”，对此当不无兴感。“著书正学术”指《东塾读书记》之平分汉宋，“考古定乐章”指《声律通考》等考索古乐。“发挥七篇秘”，则尤突出《东塾读书记·孟子》一卷的分辨性善之说。“二田岂颉颃”，指程瑶田、王白田，前者考证精确，后者推崇朱子，均为陈澧所景仰；但梁鼎芬认为“瑶田无其大，白田无其精”，尚不配与其所理解的东塾学术并称。至于“亭林有异同”一句，则不妨与前文“心知治乱故，处士不敢扬”二句参看，陈澧尝在《与胡伯蓟（锡燕）书》中尽发其说：

> 仆之为此书（按指《东塾读书记》）也，以拟《日知录》，足下所素知也。《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问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56]

陈澧尝言：“儒者著书眼光，须及上下数百年。”[57]其著《东塾读书记》，亦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自拟为顾炎武著《日知录》，却不取《日知录》的“治法”、“博学”，而专门讨论“学术”。惟其所谓“学术”，又不同于汉、宋专家之学，尝以为：“天下之乱由于做官者不知读书，读书者不知做官。”又切论训诂考据之流弊：“近儒专讲训诂，试问朝廷若使通经之士为官，能以训诂治百姓乎？”[58]陈澧亲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军兴的动荡，其时代环境，已迥异于阮元；又因会试屡不第，曾著论探讨科场改制，对于兴起人才的新

方式亦多有思考。[59]其期待学术造就人才，人才养成政治，实更近于咸同间曾国藩、吴廷栋等盛论的“人才消长”之说，亦与后来张之洞《劝学篇·序》所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的说法相契合。[60]

张之洞盛赞陈澧“尽划汉宋畛”的功绩，但二人折衷汉宋的学术资源有所出入：一为阮元以来粤东经古书院的流衍，一为同光之际京师“清流”的延续。梁鼎芬等进入张之洞圈子的“东塾学派”，正是介于二者之间。故其对于陈澧汉宋调和学说中承自阮元的论调，即平视汉、宋为两种方法，用训诂考据求得新义理的途径，并不十分在意；却更斤斤计较于发掘东塾经说中隐含的经世倾向。取舍之间，已见地方学统被政治权势改造的趋向。然而，相比于阮元所在的盛世之末，张之洞、梁鼎芬与陈澧实处于同一“雅废夷侵”、乐坏礼崩的时代。张之洞督粤后大办防务、洋务，兴复广州实学馆，创设水陆师学堂，并命书局编辑洋务书籍，竭力赶超北洋方面引进西学。不过与此同时，却仍致力于整顿书院，鼓舞人才，提倡经史之学。所欲挽救者，已不仅是汉学流弊。

四、广雅院生的陈澧观

除了张之洞与梁鼎芬的论述，广雅书院诸生对于陈澧的接受，应更能说明东塾学统在张之洞所主导文教体系中的衍变。今存《广雅书院文稿》钞本，实为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至十二月间广雅书院课艺的辑录，[61]内即收有题为《读东塾读书记》的课作八首。书院课艺是考核院生学问进境的重要手段，亦可从中窥见书院的宗旨与学风。广雅书院的课期每月两次：初旬考官课，名义上由张之洞等地方官出题；中旬考斋课，在推行学长制以前，由院长梁鼎芬出题。[62]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廖廷相辑《广雅书院诸生课题》，光绪十五年四月补考三月分斋课题，有《读日知录》、《读东塾读书记》二首。梁鼎芬在题下补注云：

> 二书博大精深，言经史、理学，言经济，均宜有所发明，空论者不录；诸君子多有是书，不得以未见为词；多习是书，亦不得以未习为词也。[63]

广雅书院学规中有“给书”制度，[64]《日知录》、《东塾读书记》即为书院配给之书，故梁鼎芬称诸生多有其书，且平日多所肄习。梁鼎芬强调二书不仅有经史理学的内容，更有经济之意，即欲向诸生灌输其用经济之学贯通顾炎武、陈澧的观念。

诸生发题作文，颇能体会梁鼎芬的用心。嘉应廪贡生黎元庄[65]即在课作中声言：“兰浦先生（陈澧）之学，亭林先生（顾炎武）之学也。先生以亭林之欲以教化转移人心，为明末之孟子；今读先生此书，知先生欲以学术正人心，不愧为今日之亭林也。”强调从孟子到顾炎武再到陈澧，三者以学术教化转移人心的宗旨一以贯之，并继而详列《东塾读书记》各卷与《日知录》持论相通之处：

> 其（陈澧）言朱子以心之德爱之理训仁，惟“肫肫其仁”一言，足以密合其说；即亭林之由葬祭而推之，仁鬼神、乡党，以及仁民爱物，以注“肫肫其仁”之旨也。其言孟子“道揆法守”以下百余言为拨乱反治之要，而以贼民之兴由下无学见学之重；即亭林引《书》以证桀纣之帅天下以暴，而上礼下学为关系存亡之意也。若夫于《易》明寡过之义，而不取象数之深微，与亭林之论《易》而取有恒之一言，无以异也。于《诗序》小雅之废而惊心四夷之交逼，又与亭林之读《诗》而伤心风俗之不详有同情也。其于《礼记》曰：道学即礼学；又曰：理学即礼学，则先生已明其关千古之学术矣。其取化民成俗，必由学证，温公论政，以学为源，则亭林所引学为人君之义也。其于《春秋左传》历引袁彦伯以下五家之言，以见春秋时风俗茂美，学行修明，犹有先王遗意。其于战国、秦汉历引老庄商韩诸子之说，以见其时燔弃诗书，以愚黔首，而大盗奸民以起，则千古学术兴废、风俗盛衰之一大变局也……然则亭林之书，详述历代风俗，而有取于东汉、北宋，以为天下之不亡，匹夫与有责也，其与先生所见，不诚后先一揆哉?[66]

黎元庄此论深得梁鼎芬的赞许，被拔为当月斋课“超等”第三名。

《东塾读书记》最为诸生称颂的段落，首推第三卷对《孟子》性善之旨的阐发。高要廪生冯祖禧指出，陈澧论孟子有纠正汉学家偏颇的意味：“国初经师，著述丛出，而于《孟子》一经，寥寥无几，当时汉学盛行，诸儒皆不喜言义理，《孟子》七篇多说义理故也……是书于《孟子》一经独致精力。”[67]大埔廪生饶从龙则以为陈澧之学本自孟子：“故其论孟子之言性善也綦详，其解人无有不善，以为虽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谓人无有不善也。斯言发孟子之首，最为明切，诚孟子之功臣矣。”[68]在经世致用方面，陈澧主张读《周礼》当与《大清会典》相配，讲道学者必讲礼学。《考工记》与西学相通等观点，亦屡屡被诸生提及。茂名优廪生林鹤年曾总结陈澧“谓不宝远物而远人不格，是中国之福；谓《苕之华·传》云治日少而乱日多，此语有无穷感慨；谓《考工记》实可补经，设一任贱工，致中国之物不如外国，所关甚大；谓读史至张布不使冲等入侍，此事甚可惜。是先生读书论世，有慨乎言之者，不尽以解经见长也。”[69]突显陈澧治学的经世情怀，与张之洞、梁鼎芬所见颇相合。

此外，陈澧沟通汉宋、扫除门户的治学方法，亦是广雅诸生反复致意之所在。兴宁县拔贡生罗献修即指出，陈澧调停汉宋之间，并非漫无原则的比附：“郑（玄）注诚美善矣，记《尚书》有云郑义与孔（安国）不同，有伪孔胜于郑者；记《礼记》有云郑注句绝之非，陈氏（澔）《集注》句绝之得者。朱子《论语集注》精矣，记有云皇（侃）《疏》最精确者，有谓不如马（融）注者。苟有未安，虽所尊信，不必曲护；苟其可采，虽甚伪杂，必录其善。”[70]来自广西博白的廪生李桂馚亦看到，陈澧于《尚书》则兼取蔡沈《集传》，于《论语》择取皇侃《疏》，于《孟子》不废伪孙奭《疏》，“盖门户之见无所介于胸中，惟求其义理之长者而从之而已”。[71]李桂馚被拔为超等并列第二名（第一名空出）。[72]梁鼎芬在其课作后批道：“细心研读，时有所见，立论亦颇得陈氏家法，非躁心人所能。”相比之下，那些空发议论或离文阐释的课作则难以得到好评。故梁鼎芬等对陈澧“学术以正人心”的认同，不仅指治学内容的平正，更涉及治学心态、述学文体的涵养，即陈澧所谓离经辨志以戒浮躁。[73]受到梁鼎芬称许的李桂馚课作，连行文都刻意模仿《东塾读书记》引而不发、“平情蓄德”的风格。

总而言之，在院长梁鼎芬的主动引导下，广雅书院诸生对陈澧学术的理解，基本上符合张之洞等文教指导者定下的基调：认同《东塾读书记》救治学弊的平正风格，同时应对时代变化，更强调从顾炎武到陈澧以学术正人心的经世倾向，使“东塾学派”折衷汉宋的新传统逐渐覆盖（或包含）阮元以降经古书院的专经习气。当然，地方学统往往不易为外来政治势力所撼动。张之洞督粤期间，广雅书院官斋课的命题范围相当广泛，内如《毛诗大义述》、《孟子大义述》、《微言大义说》等题，贯彻了张之洞治经重大义的主张；《读史记朝鲜列传书后》、《读齐民要术书后》、《拟创建两广舆图局议》诸题，更指向当下的经世关切。[74]尤应注意者，乃光绪十五年四月张之洞所出的官课题《性理字义疏证》。该题直指张之洞、宝廷等与阮元以降粤学的分歧点，似要借此试探年轻一代学子的态度。然而，被《广雅书院文稿》收录的两篇课作，均认同阮元由训诂以求义理的方法：虽以汉儒训诂包含宋儒性理，但“宋儒之说虽极精密，终亦不能出其范围也”，甚至援引阮元《性命古训》等在宋儒性理之外寻求新义理的著作。粤东汉学自有其执拗不变的底色，非外来风气所能消磨。[75]

余论

张之洞督粤后，随着“清流”背景的淡出，开始尝试与地方学术传统进行对话。借地利之便，陈澧一派的粤学正统被张之洞援引为资源，“东塾学派”成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梁鼎芬等东塾后学却截断从阮元到陈澧的连续脉络，发明了一种注重以学术影响世道人心的新传统。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移督湖广，兴建两湖

书院，延续了广雅书院以经世致用之学调停汉宋的思路。

戊戌年（1898）春，两湖书院刊行《劝学篇》。该书由张之洞主导编纂，但参与其事者尚有梁鼎芬、黄绍箕、陈庆年等两湖书院分教及官书局职员。《劝学篇》的具体观点已受到西学的濡染，并不能与此前《辅轩语》、《书目答问》等学术门径书相提并论。但其中尚有《守约》一篇，介绍达成"中学"修养的捷径："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76]此种"损之又损、义主救世"的趋势，在亲历了两次"夷乱"的陈澧那里，实则早已有所发露：

> 仆读书三十年，今乃知读书之法：甲部则注疏、朱子四书、《说文》、《广韵》；乙部则正史、《通鉴》；丙部则周末诸子、宋五子、陆象山，本朝顾亭林、陆清献；丁部则《文选》，李、杜、韩、苏集。此外虽流览，不敢杂也。书以甲部为主，疏解繁多，约之以郑君、朱子。经文浩博，约之以《孝经》、《论语》，约而又约，则《学而》一篇而已。[77]

张之洞对陈澧一派学术多有会心，且最重视梁鼎芬等东塾门人。然而，陈澧的由博返约不过是治经取向的一种表白，意在挽救考证琐碎的流弊；张之洞却是面临着现实的西学压力，欲将其落实为具体的行动。问题已经不是治经琐碎，而是无人治经，故示以简易门径，以保存旧学于万一。《劝学篇》多有引用《东塾读书记》的段落，[78]《守约》篇末更提到"损之又损"的底线：如果资性平弱者连此速成方案都无力（或无暇）肄习，那么就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四书，则"于中学亦有主宰矣"。[79]若此，地方学统在清末教育改制与知识转型进程中的潜在作用，实不容小视。

---

①关于广雅书院的制度与人事，参见周汉光：《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第四、五章。苏云峰：《广雅书院（一八八八～一九〇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6月，第239—304页。两湖书院的情况，亦由苏云峰在其《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再版）一书中设专节进行了初步探讨。

②参见《许景澄致张之洞》、《袁昶致张之洞》，分别载《赵凤昌藏札》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54、256、269页；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页。但除缪荃孙为广雅书局校书外，其他数人似乎均未实任。

③分别参见《李文田致张之洞》、《梁鼎芬致张之洞》，《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449页；第7册，第508、512页；张之洞：《札运司开设书局》（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初七日），苑书义、李秉新、孙华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公牍八，第2506页。

④参见《屠寄致赵凤昌》（三月八日），载《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521—522页。

⑤梁鼎芬：《癸丑浴佛日伯严于樊园招饯林侍郎游泰山题诗何诗孙图上》诗自注："余与朱（一新）、林（绍年）两前辈皆不识南皮（张之洞），三人相继主讲端溪书院，皆叔峤（杨锐）言之也。"余绍宋编：《节庵先生遗诗》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80页。

⑥《梁鼎芬致张之洞》，见《赵凤昌藏札》第7册，第510—511页。

⑦王秉恩《致缪荃孙》一，《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07页。

⑧《张之洞致缪荃孙》，载《赵凤昌藏札》第5册，第421—426页。

⑨参见《廖平致赵凤昌》，《赵凤昌藏札》第5册，第444—447页。

⑩参见《王绳生致赵凤昌》，《赵凤昌藏札》第5册，第465—468页。

⑪诸章程俱载傅维森编：《端溪书院志》卷四，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84—386页。

⑫张之洞：《奏为创建两广书院以培士品而储人材恭折奏明立案仰祈圣鉴事》（影印原稿），见《赵凤昌藏札》第7册，第299页。

⑬同前注所引影印原稿，第306页。

⑭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折》（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1册，奏议二十二，第585—587页。

⑮《广雅书院学规》（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订），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46页。

⑯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十三年条下："公（张之洞）意欲扩充端溪，故延文忠（梁鼎芬）主讲，及广雅书院成，文忠率端溪经古诸生，移居省城；其专课时文者，仍留端溪。"可见端溪、广雅两书院之间的关系。后来朱一新亦先任端溪院长，继主广雅；二者学风实有相通之处。
⑰《艺风老人日记》己丑（1889）二月廿六日条下，影印本第1册，第114页。
⑱《创建广雅书院折》，《张之洞全集》第12册，奏议二十二，第585页。
⑲胡适：《书院制史略》，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3号，"选录"栏，1924年2月10日。
⑳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折》，《张之洞全集》第12册，奏议二十二，第586页。
㉑分别参见张之洞：《致潮州方守、方提台》、《致琼州朱道》、《致琼州朱道、徐守、崖州唐牧》，《张之洞全集》第7册，电牍九，第5314、5288页。又可参见张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记》的记载，《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29—10630页。
㉒均见张之洞《札广雅书院提调设立分校》（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张之洞全集》第4册，公牍十，第2606—2608页。按照学海堂旧制，学长本应从在院诸生中拔取。但广雅书院开院未久，尚无合适人选，故仍借用学海堂人才。
㉓前揭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347页。
㉔张之洞《请颁广雅书院扁额折》（光绪十五年八月廿二日），《张之洞全集》第1册，奏议二十六，第695—696页。
㉕两组诗的写作时间，据樊增祥《张文襄公全集诗跋》，"皆督楚时作"。参见庞坚编校：《张之洞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8页。
㉖载《张之洞诗文集》卷三，诗集三，第121页。
㉗《学海堂志·雅集》："每岁春孟，同人团拜于堂，仰止师承，如亲提命。因定于正月二十日集会，仪征公（阮元）寿日也。"见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71页。
㉘陈澧《与赵子韶书》其五："冬季学海堂课卷太少，五条题只收一百廿卷，殊不成事体。吾弟必须作二卷，写真名，又可多作数卷托名者，总在腊月十五六交到可矣。"黄国声点校：《东塾集外文》卷五，见《陈澧集》第1册，第472页。
㉙《札三司增设学海堂生额并增修馆舍》，《张之洞全集》第4册，公牍九，第2552—2553页。
㉚事见汪兆镛：《椶窗杂记》卷三，民国癸未（1943）序铅印本。
㉛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光绪五年条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16页。汪宗衍指出，张之洞主试浙江在同治六年（1867）丁卯，至光绪五年（1889）己卯恰为"十二年"，陈澧书"庚午岁"为笔误。
㉜袁昶：《壶公师寿言节略》，见《香严尚书寿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页。
㉝陈澧：《张南山先生墓碑铭》、《自述》，分别见《东塾集》卷五、《东塾读书记》卷首，《陈澧集》第1册，第215—217页；第2册，第10页。
㉞参见梁鼎芬：《答杨模见赠之作》诗注，《节庵先生遗诗》卷五，第228页。
㉟关于"东塾学派"与晚清汉宋调和论的关系，参见李绪柏：《东塾学派与汉宋调和》，载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第75—194页。
㊱梁鼎芬《答杨模见赠之作》，《节庵先生遗诗》卷五，第226—227页。括号中标"自注"的内容为梁鼎芬自注，此外为诗集编者余绍宋加注。
㊲参见《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三《人物志六》，《中国方志丛书》第49种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301—302页。《应读书目》与《书目答问》暗合事，又见前揭汪兆镛：《椶窗杂记》卷三。
㊳张之洞：《致陶春海》，《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六，第10289页。
㊴参见《番禺县续志》卷二十六《人物志九》，第354—355页。
㊵参见林国赓为另一广东学人金武祥（亦任广雅书局分校）《理学庸言》所作序，文载《广东文征》第6册，香港：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73年，第296页。
㊶《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三《人物志六》，第303页。
㊷文廷式《致于式枚书》二，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卷六，第1177页。
㊸陈树镛小传，《广东文征》第6册，第395页。
㊹光绪十四年（1888）春夏间张之洞与宝廷的通信，分别散见于：1、张之洞本集（《致宝竹坡》二通，《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八，第10343—10345页）；2、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赵凤昌藏札》（宝廷《致张之洞》一通、《宝廷寄张之洞诗稿》一通，《赵凤昌藏札》第7册，第358—366页）；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之洞所接信札》（宝廷《致张之洞》二通）。从内容推测，为同一时期的往来书信。
㊺张之洞：《致宝竹坡》其二，《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八，第10344—10345页。着重点笔者所加。
㊻宝廷《致张之洞二首》其一（光绪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去岁涉猎汉学、宋学诸书，作《经说》、《理气性情说》数十篇。"见《张之洞所接信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件，索书号：SB/818.179/1332：7。

㊼陈澧：《与许子远书二十一首》其一，《东塾集外文》卷五，《陈澧集》第1册，第454页。
㊽参见陈澧：《东塾杂俎》卷十一，吕永光校点，《陈澧集》第2册，第657—658页。
㊾参见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陈澧集》第2册，第374页。
㊿陈澧：《东塾杂俎》卷十一，《东塾集》第2册，第657页。按此为未刊遗稿，张之洞当时或未寓目；但在刻版行世的《东塾读书记》中，亦颇多认同阮元论“仁”、“性”等理学概念的段落，张之洞应见之。
(51)参见张之洞：《辅轩语·语学》，《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94页。
(52)所以钱穆认为，陈澧的平分汉宋仍以汉学为根本：“东塾讲学，所谓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者，其实仍是经学盛时惠、戴所称‘古训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解。”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41、680页。
(53)梁鼎芬：《至丰湖书院日记》，杨敬安编：《节庵先生遗稿》卷三，1962年香港排印本，第49页。按：此二语均出自胡宏，见黄宗羲撰、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陈金生、梁运华校点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2、1383页。
(54)梁鼎芬：《至丰湖书院日记》，《节庵先生遗稿》卷三，第53页。按梁鼎芬所述实本自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亦可见其在汉、宋之间的立场。
(55)《答杨模见赠之作》，《节庵先生遗诗》卷五，第227页。原注略，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56)《东塾集》卷四，《陈澧集》第1册，第175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57)陈澧：《与徐子远书二十一首》其一，《东塾集外文》卷五，《陈澧集》第1册，第454页。
(58)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陈澧集》第2册，第363、359页。
(59)参见陈澧：《科场议》三篇及《推广拔贡议》，《东塾集》卷二，《陈澧集》第1册，第77—82页。
(60)《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04页。
(61)《广雅书院文稿》十二册，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红格钞本，所录为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至十二月广雅书院课艺，并注明诸生籍贯、等第，按月编排，官课在前，斋课在后。
(62)《广雅书院学规》，前揭《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147页。
(63)《己丑四月补考三月分斋课题》，《广雅书院诸生课题》第1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广雅书院刻本。
(64)《广雅书院学规》：“诸生每名皆发给切要书籍，以资预习。”见前揭《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147页。
(65)据廖廷相编《广雅书院同舍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广雅书院刻本），黎元庄为嘉应直隶州廪贡生，至少在光绪十五年四月以前，在院肄业。
(66)黎元庄：《读东塾读书记上》，《广雅书院文稿》钞本，第2册。
(67)冯祖禧：《读东塾读书记四》，《广雅书院文稿》第2册。
(68)饶从龙：《读东塾读书记》，《广雅书院文稿》第2册。
(69)林鹤年：《读东塾读书记》，《广雅书院文稿》第2册。
(70)罗献修：《读东塾读书记》，《广雅书院文稿》第2册。
(71)李桂馚：《读东熟读书记（孝经至诗经）》，《广雅书院文稿》第2册。据《广雅书院同舍录》，李桂馚为广西省博白县廪生，咸丰六年（1856）生人，在院时间为光绪十四年七月至二十三年五月。此次斋课列超等第二名。
(72)另一人为归善县廪生杨寿昌，同治七年（1868）生人，在院时间为光绪十四年七月至十五年九月。按此次斋课有两名超等第二，应是并列，而第一名空出。
(73)《东塾读书记》卷九《礼记》：“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原注：阮文达公《题凌次仲校礼图》诗云：‘浅儒袭汉学，心力每浮躁。’）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断句读之，则不能浮躁，不独有益于读书，亦有益于治心矣。”见《陈澧集》第2册，第170页。
(74)《广雅书院诸生课题》，第1册。
(75)见罗献珍、吴萃英：《性理字义疏证》，《广雅书院文稿》，第2册。罗献珍履历见前揭。据《广雅书院同舍录》，吴萃英为南海县附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生人，在院时间为光绪十四年七月至光绪廿三年五月。吴萃英课作中还颇引阮元《性命古训》之说。此次官课，罗献珍、吴萃英分列超等第一、第二。
(76)张之洞：《劝学篇·守约》，《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26页。
(77)陈澧《与友人书》二首其一，《东塾集外文》卷五，《陈澧集》第1册，第473页。
(78)如《守约》篇论理学，提到“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最善”；《变科举》篇末抄录“《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等，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30、9752—9753页。
(79)《劝学篇·守约》，《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32页。